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47

穆罕默德和查理曼

[比] 亨利·皮朗 著

王晋新 译

MOHANMMED
AND CHARLEMAGNE



上海三联书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47

穆罕默德和查理曼

[比] 亨利·皮朗 著

王晋新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穆罕默德和查理曼/(比)皮朗著;王晋新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11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ISBN 978-7-5426-3650-8

I. ①穆… II. ①皮… ②王… III. ①阿拉伯国家-历史-研究②西方国家-历史-研究 IV.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8643号

穆罕默德和查理曼

著 者/[比]亨利·皮朗
译 者/王晋新

责任编辑/黄 韬
装帧设计/鲁继德
监 制/李 敏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00)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2号楼10楼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1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300
印 张/24
书 号/ISBN 978-7-5426-3650-8/K·159
定 价/48.00元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总 序

陈 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

高质量、原创作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中译本序言

皮朗与“皮朗命题”： 对西方文明形成时代的重新审视

西方文明的形成，是一个具有多重意味且“常议常新”的话题。国际学术界对此进行了长期的研讨，得出了众多经典结论。然而，近些年随着自己对中外各类经典史著的翻检、重读，笔者愈发觉得有许多经典著述和结论值得进一步研读或重新审视。皮朗及“皮朗命题”即为其中之一。以下文字，旨在从文明史研究角度着眼，结合欧美学界的研究成果，探讨皮朗学说对当下我们在认知西方文明形成问题方面的启迪意义。这些感想或感悟，权作为译者序论，不当之处，恭请学界方家指正。

—

亨利·皮朗，比利时著名历史学家，生于1862年，病逝于1935年。在比利时史、欧洲中世纪城市史、商业史、工业史以及中世纪文献学等诸多领域，他都取得了丰硕成就。有人曾感叹道：在鸿篇巨制《比利时史》一书中，他将整个民族的情感连接了起来，《经济社会史》一书乃是他写就的一部永恒经典之作，在《欧洲史》一书中，他敞开心扉，向一个更为广泛世界的读者们倾诉，而那部《中世纪城市》又使史学界陷入一片躁动之中，《穆罕默德和查理曼》更是

至今仍在向我们挑战。^①自20世纪40年代始,皮朗的多部学术著述便被陆续译介到中国,并且一再地再版。^②然而,除了马克垚、刘景华等曾对皮朗有关西欧城市起源的观点做过专题性辨析,郭方曾就皮朗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的中文译本再版写过一篇短文之外,^③中国学界鲜有对皮朗学术思想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论著。

西方文明究竟是在何时并在何种历史背景中形成的,而日耳曼民族迁徙和穆斯林扩张对西方文明的形成各自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是皮朗一生特别是晚年学术探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据其子所言:“我父亲一次又一次地对他所能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研究,从未停止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验证,它已经成为他生命之中最后二十年中最大的学术兴趣所在。”^④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皮朗就对晚期罗马帝国各种制度在法兰克社会中的广泛遗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直到他在战争期间被囚禁在德国的战俘营,为一批俄国战俘讲授欧洲经济史时,解答这一基本问题的想法方降临到他的脑畔。后来,在德国图林根克虏兹堡的乡村流放期间撰写

-
- ① 格雷·鲍伊斯:《布莱斯·莱昂对亨利·皮朗生平和智慧的研究》(Gray C. Boyce, Henri Pirenne: A Biographical and Intellectual Study by Bryce Lyon.),载《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80卷,第4期(1975年10月)第988页。
- ② 如商务印书馆早在1940年就曾出版了胡伊默所翻译的《中古欧洲社会经济史》;1964年,乐文又将此书重新翻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又出版了陈国樾翻译的《中世纪的城市》。只不过各位译者对作者姓名的翻译不尽相同,如胡伊默将其译为亨利·皮楞,乐文译为亨利·皮朗,耿淡如译为亨利·比伦纳;而齐思和在为耿淡如所译一书的中文序言中,将其译为亨利·庇伦;孙秉莹、谢德风在其翻译的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中,译为亨利·佩朗;陈国樾译为亨利·皮雷纳;还有人将其译为昂利·皮雷纳或昂利·比兰纳等等。
- ③ 请见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292页;刘景华:《西欧中世纪城市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3页;郭方:亨利·皮朗的《中世纪欧洲社会经济史》,《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21日,第6版。
- ④ [比]亨利·皮朗:《穆罕默德和查理曼》(H. Pirenne, *Mohammed and Charlemagne*),伦敦1939年版,第9页。

《欧洲史》一书时，^①他才首次强调地指出：伊斯兰扩张征服与中世纪西方形成之间存在一种十分密切的联系。1918年之后，皮朗开始对这一历史过程公开加以解说，最早是刊载在1922年比利时的一份杂志之上的一篇名为“穆罕默德与查理曼”的短文，^②而后，在1923年布鲁塞尔国际史学大会和1928年奥斯陆国际史学大会上，他对这一主题又做了进一步的阐发。这些新的理念也构成了他在1925年出版的《中世纪城市》一书前几章内容的一个关键部分。^③直到其生命即将走完全部历程前夕，皮朗才在自己所撰写的《穆罕默德与查理曼》一书中完成了对这些问题全面系统的解说。1937年，皮朗的家人和弟子们对该书的法文手稿进行整理、修补工作，正式付梓问世。1939年，该书又被译成英文。^④西方学界将散见在有关文章和著述中皮朗的思考和观点集中在一起，贴切表述为“皮朗命题”(the Pirenne thesis)。

依据皮朗的各种著述，笔者将其命题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匈奴和日耳曼各个民族对罗马世界的冲击，虽颠覆了西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上并不具有以往人们所赋予的那么巨大的意义；作为罗马世界最基本的特性——地中海的统一性——依旧存在着，并仍旧决定着当时西方社会的基本框架结构。而7世纪以后，来自阿拉伯—伊斯兰教狂飙般的扩张则对西方社会历史命运造成了根本性的改变。它彻底地砸碎了各种古典传统，使地中海世界被割裂为两大部分，即穆斯林所掌控的西地中海和

① 皮朗生前并未将该书公开出版，直到他去世之后该书才正式出版。

② 汤普森认为，皮朗首次公开提出的这一思想的时间是在1923年，请见其所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75页；而西方史学界一般都认为这一时间是在1922年，但据其子雅克斯·皮朗所言，似乎皮朗本人在1921年给里尔大学所作的演讲中就已公开了自己这一新的学术主张。请参见《穆罕默德和查理曼》序言第3页。

③ [比]亨利·皮朗：《中世纪城市》，陈国樾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34页。该著作是皮朗本人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学内容的结集。

④ 据笔者所收集的信息，该书英文版有1939年、1957年等版本，而最近版本是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的1992年版。

由拜占庭所支配的东地中海；正是在这种局势作用下，西方社会首次出现了由地中海向北方地区的转移，并蜗居在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之中，其后果就是墨洛温王朝垮台和加洛林国家兴起。由此，西方社会才进入了中世纪时代，新的西方文明方得以诞生。皮朗本人曾以“倘若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就根本是无法想象的”这种形象的表述作为自己学术主张的集中表达。^①

皮朗所提出的命题在西方学术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赞同者有之，但批驳者更多。众多学者或从观点方面，或从史料方面，对皮朗学说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批判。初始，争论主要集中在对皮朗对各种历史文献的解读方面，他被指责过分地强调了某些材料而又过分地忽视了其他材料。例如，穆罕默德对地中海地区的商业贸易是否真正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再如纸草、东方奢侈性纺织品、黄金硬通货等“四种消失”，是否正如罗伯特·S.洛普兹所指出的那样：“既与阿拉伯人的扩张入侵不属于相同的时代，而且这四种消失之间也不是在同一个时期发生的。”^②然而，对这场论战做出贡献的各位参加者，几乎都承认这方面的文献史料资源是极度匮乏的；相同的一些数据资料可以用来作为支撑相互尖锐对立的观点的论据。例如，在贸易方面的各种关键性的信息数据大部分皆来自于为数不多的几位圣徒传记，或来自于驳杂的文书信件和为数极为稀少的法律文献及规章。皮朗反复使用都尔的格雷戈里所著的《法兰克人史》这一历史文献，但问题是这部著述又具有多大的可靠性呢？皮朗对当时整个欧洲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熟悉程度有多大呢？皮朗是否占据了一个可对法兰克经济状况进行准确评估的位置了吗？而那些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显然是不足以

① [比]亨利·皮朗：《穆罕默德和查理曼》，第234页。

② 罗伯特·洛普兹：《对〈穆罕默德和查理曼〉的一项修正》(Robert. S. Lopez, Mohammed and Charlemagne: a revision), 载《观察》(Speculum)第18卷, 1943年第1期, 第14—38页。

作为对这些问题的答案。^① 诺曼·F. 坎特也指出：虽然皮朗命题的吸引力是很明显的，“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几位史学家著述则认为《穆罕默德和查理曼》一书的主题过分夸张，而且对于早期中世纪文明作了过于简单化的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法国历史学家们研究成果的影响，使得“皮朗关于早期日耳曼人的解说遭到了严重的削弱”。^②

坦率地讲，笔者在欧洲中世纪早期历史方面的造诣实在有限，而且对这一领域研究学术史的了解也相当浅薄，故很难对有关“皮朗命题”论争做出准确而全面的判断。仅就自己所阅读的有关文献、论著来看，皮朗在史料、文献的使用以及最终结论等诸多方面，正如那些批评者所言，显然存在一定的缺欠或不周之处。故而他的命题自然难以获得全面意义上的确立和学界同仁们的广泛认同。

在“史料”与“结论”这两处关乎一种学说命运最为紧要的环节皆出现了“问题”，我们是否就可以断定皮朗的学说休矣，“皮朗命题”休矣？然而笔者觉得下这种结论尚为时过早。理由有二：一是史料方面，作为一个享有盛誉的严谨学者，皮朗历经数十载时光，在史料爬梳、整理和分析方面所下的功夫极深，似乎已经将当时他所能收集到的所有的材料都网罗殆尽了。在撰写最后一部著述过程中，皮朗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其中既有《法兰克人史》等各类编年史书，也有各个中古王国的法令汇编和罗马教会档案汇编等原始文献；既以往昔历史文献作为自己立论之基础，也常常援引现代史学的论著以为自己观点张目。据笔者粗略统计，皮朗先后引用的法、德、英和拉丁文、希腊文等各种语言的文献，共计为

① [英]理查德·霍吉斯、大卫·怀特豪斯：《穆罕默德、查理曼与欧洲的形成：考古学与皮朗命题》(Richard Hodges & David Whitehouse, *Mohammed Charlemagne & the Origins of Europe Archaeology and the Pirenne thesis*)，达克沃斯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

② [美]诺曼·F. 坎特：《中世纪时代的文明》(Norman F. Cantor,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Middle Ages*)，哈普·柯林斯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92页。

170—180 种左右。故而可以断定他绝非是一个凭空杜撰、游谈无根的学者，但遗憾的是，他所能够做到的一切尚不足以支撑自己的结论。为何如此？笔者贸然揣测，除了过分依重某些史料之外，可能也与在当时学术环境下，皮朗所能掌握史料的数量和种类尚不够全面、系统有关。其次，笔者以为任何一位学者在学术上被同行们予以评说、指责甚至被批判，都不是一件仅具有负面意义的可悲事情。只要批评者出于纯正的学术目的，秉持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任何学术批评或批判所导致的结果都应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因为学术论争和论战是推动学术研究持续而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对于西方学术界给予皮朗学说的批驳也应作如是观。对于这些批驳，我们绝不能简单地加以接受，正如我们对于皮朗的观点不能简单地予以接受一样。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一是从那些对皮朗否定性的批驳中，探究皮朗的不足或过错究竟有哪些？这些过错又是源于何种原因？尤其要注意西方学界在对皮朗的批驳中，是否对其学说主张还有什么赞许之处？二是在相互参校基础上考察、在判定那些否定性批驳的学理价值和意义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对皮朗学说的学理价值作一番探讨；即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评判一下皮朗学说是否对后世史学研究具有某种启发、引导的意义与功用？因此，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思考角度，不是仅仅就史料证据是否充分，最终结论是否恰当进行思辨、考量，而是对皮朗所择取的观察视野和史观等方面作一番剖析，或许会使我们在另一个层面上，对皮朗学说乃至对西方文明形成的历史认识达到更为确切而全面的目的。

二

皮朗的学术主张之所以卓然自成一家并产生巨大影响，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他以一种惊世骇俗的另类语汇对早期西方文明的形成做出了全新解说；二是他所采用的视野、角度和方法，同西方数百年来学术传统截然相悖。而依笔者看来，皮朗命题所具有的“颠覆性”力量，在相当大程度上皆源自于此。

以往在对西方文明形成的考察中,学者们主要着眼、着力对在5—7世纪日耳曼因素和罗马因素这两大元素之间关系的认识,而形成了一种“二元结构”的解释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中,时时处处都体现出日耳曼与罗马、古典与中世纪、奴隶制与封建制这样一一对应的两种要素、两个时代和两种制度的二元关系。并且为这种二元模式所困,西方学者们长期陷入两种因素中哪种为主、哪种为辅的争辩之中。霍吉斯指出:“自文艺复兴以来,历史学家们一直强调黑暗时代‘哥特人’的黯淡状态,并将他们的目光聚焦在5世纪初期匈奴人阿提拉对富有的罗马文明所造成的天崩地裂般的后果之上。当然,这一观点是吉本那部不朽著述的基本观点,反过来它又成为19世纪史学家们孜孜以求加以详尽验证的对象。结果,研究古代世界的史学家们将5世纪作为他们研究的终点,而他们那些研究中世纪史的同行人,则把从那一时期开始的日耳曼人对西部欧洲的淹没作为他们学术研究的开端,这一框架模式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罗马派’的学者们将日耳曼人对西欧的占领视为黑暗时代的开始,而中世纪派则力图反映出……一个业已衰败而且毫无创造性的巨无霸的没落和一种崭新的充满活力的政治实体的孕育。”^①

苏联史学界虽然在史观上与西方学术界有很大差异,强调生产关系变革,即从奴隶生产关系向封建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性,但其分析结构仍未摆脱上述“二元模式”框架。中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大体延续着这一状况。记得笔者在就学期间,“日耳曼因素与罗马因素”曾是世界中古史教材中和各种著述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组概念。似乎多少年来,国内学界在这一领域也未见到有何大的进展与突破。

而皮朗的解说则全然迥异于传统学说的分析框架,其关键之处有以下几端:第一,他以地中海整个地区作为自己考察的时空视

① [英]理查德·霍吉斯、大卫·怀特豪斯:《穆罕默德、查理曼与欧洲的形成》,第4页。

野。自古以来,地中海周边的各个民族、国家、文明之间皆凭藉地中海保持着一定的关系,而地中海也凭藉这些往来关系逐渐地生化为一个区域性的世界。随着亚历山大征服,特别是罗马人连续数百年的扩张,地中海地区逐渐演化成为一个具有相当统一性和一体化的文明空间。这种一体化不仅仅意味着罗马帝国政治构架同地中海地理框架的全然合一,同时还意味着频繁的经济往来和密切的文化交往。正是这一切方使得古典文明达到了顶峰。正如皮朗所指出的那样:“在人类结构所有奇妙的特征之中,罗马帝国所具备的最显著并且也是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其地中海的特性。尽管帝国的东部地区为希腊语区,西部为拉丁语区,但这种地中海特性却使得整个罗马帝国具有了一种一体性,正是这种一体性将一种整体感赋予给帝国的各个行省。在拉丁语中,*Mare nostrum* 这一词语的含义为:我们的海,这片内陆的海是各种思想、各类宗教和诸种商品相互交往的通衢大道。”接下来,他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展开了对日耳曼各个民族的入侵、西罗马帝国衰亡和东罗马帝国的反扑过程与后果的历史分析,其结论是在阿拉伯人对地中海世界发起冲击之前“好像还没有什么事物可以标志罗马帝国所创建的地中海文明共同体的终结”,也“没有什么事物可以显示出社会的千年演化过程会戛然而止”。其缘故就是“新近形成的世界并没有丧失古代世界的那种地中海的特征”。皮朗认为中世纪时代形成要比通常确定的时间晚得多,而且这一过程相当漫长,“可以说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即从650年到750年。正是在这一无序混乱阶段中,古典的传统慢慢地消失了,而新的因素则开始出现。……及至公元800年,这一发展过程以一个新帝国的形成而宣告结束”。^①从其表述中我们看到,他把对西方早期文明形成的考察时段由以往的5—7世纪延伸到了8世纪乃至9世纪。笔者以为,这种时间维度的延伸,是皮朗分析模式中空间维度扩展所必然导致的后果。如果我们将“与古代的断裂”视作为他对时间要素的

^① [比]亨利·皮朗:《穆罕默德与查理曼》,第17、144—145、285页。

表述,那么“地中海的分裂”则显现出他对空间要素的关注,而时空两大要素在他的分析中又始终紧密地有机地联结为一体。

第二,他在对西方早期文明的认识中,除了传统史学早已关注的政治、军事等角度与层面之外,将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沿袭、变迁也统统纳入到考察范围之中,并给予了更多和更为深入的关注。应当说,20世纪之初的西方史学界,举凡社会、经济、商业、城市、货币、宗教、文化等各类专门史研究均已获得一定的成果。从皮朗文著所参考引用的文献中,可以看出他在相当大程度上借助于这些研究成果,而且皮朗的学术旨趣一直就集中在经济史、城市史、商业史等领域之中,并取得了令同行们钦佩的成就。汤普森就将皮朗列入到“经济和社会史家”一类之中,并称其为“已去世的最后一位伟大经济史学家”。^①但更应注意的是,皮朗还是第一位把这些学术成果综合地集中起来运用于西方文明早期历史总体研究当中的史学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从对中世纪经济史的思考中,开始萌发出对早期西方文明形成问题进行重新探索的意识。此后,十几年间,皮朗始终坚持对各种深层结构的史料进行收集、爬梳、整理,从而使其研究具有了别具一格的坚实与厚重。诚如冈绍夫所言:“他把自己一生最后的几年时光都用于可以称之为这一时期的中心问题,即古代世界向中世纪文明过渡的研究之中,这一主题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诸多学者都极具吸引力;其中就有A.道普什、F.洛特和C.道森等人。后两者对此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心理和观念形态之上,而皮朗……则主要是从经济因素来探讨这一主题。”^②然而,皮朗的证据来自对民众物质生活的研究和思考——他们吃什么、穿什么、如何谋生,他们是否可以拥有土地或打官司。因此那些想要批评其理论的人,不得不研究

① [美]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四分册),第597页。

② F.冈绍夫:《亨利·皮朗与经济史研究》(F. L. Ganshof, Henri Pirenne and Economic History),载《经济史评论》(*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6卷,1936年第2期,第184页。

同一地区的人类生活。不可避免地，他们的研究重心转向了关于物质财产和贸易内容的记载。^①

第三，非常注重“日耳曼—罗马”之外的历史力量对西方早期文明形成的作用。皮朗将传统的二元模式彻底地抛弃，把当时所有参与地中海这一历史空间变革的力量都熔于一炉，统统纳入到自己目光的审视之下，建构起由双向互动、多向联动等层面构成的多维分析框架，对日耳曼、匈奴和斯拉夫各个民族以及拜占庭、阿拉伯等各种历史力量在西方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加以缜密地辨析与解说。而在对外部力量的辨析中，西欧与拜占庭之间关系的变化是皮朗始终关注的焦点之一。而且他还将二者之间的最后分离作为西方文明形成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从而为“把拜占庭史和西欧史的来源和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供了比任何时候都多的理由”。^② 而伊斯兰教大扩张对于西方文明形成的影响与作用，是皮朗最为关注的另一个焦点。这是他学术思想中最具特色也最富有挑战性和创新性之处。可以肯定皮朗本人的确不是阿拉伯史方面的专家，但他却是第一位对阿拉伯—伊斯兰教在西方文明形成中的作用进行全面、系统考察的历史学家。早在20世纪初年，皮朗就提出了“穆罕默德教海权在西地中海的兴起，在破坏西方商业并使西欧陷入漫长的自然经济方面，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的观点。^③ 此后，他不断地重申这一主张并加以完善补充。最后，在《穆罕默德和查理曼》一书中予以全面的阐述。皮朗强调指出：

将伊斯兰教扩张对罗马帝国的影响同日耳曼人入侵对罗马帝国的影响加以比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没有哪个事物能够比这种比较更具有价值，也没有哪个事物能够像这种比较那

① 柯娇燕(Pameta Kyle Crossley):《什么是全球史》，刘文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

② [美]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四分册)，第727页。

③ [美]汤普森:《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卷)，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75页。

样促使我们对7世纪伊斯兰世界的扩张予以全面认识理解。^①

正是通过对两次重大历史运动的比较，皮朗指出了日耳曼人入侵作用的有限性，并凸显出了穆斯林力量对西方文明的巨大影响。他说：

尽管日耳曼人入侵所造成的后果是翻天覆地的并具有极大的解构性，但是新的原则却没有出现；既没有形成新的经济的或社会的新的秩序，也没有形成新的语言，没有形成各类制度。文明继续生存的环境依旧是地中海。……导致古典时代传统发生断裂的原因是人们所不曾预料的伊斯兰教迅猛的大扩展。这种扩展的后果就是致使东方最终地与西方分裂，以及地中海统一性的终结。像非洲和西班牙等以往一直作为西方共同体中一部分的地区，自此转入到巴格达的轨道之中。在这些地区之中，另外一种的宗教信仰和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化得以形成。与此同时，在转变成为穆斯林湖泊之后的西部地中海海域，从此不再具有以往那种连接东西方商业贸易和思想文化的通衢大道的功用。^②

在对西方文明形成的早期，也即欧洲中世纪早期历史过程的思考与认识方面，皮朗所得出的结论或许值得商榷，但其所创建的那种长时段、大空间和多维度的探索模式所具有独特性和启发性却是毋庸置疑的。

三

将皮朗的学说置于西方史学发展的过程之中，我们可发现它不

① [比]亨利·皮朗：《穆罕默德和查理曼》，第147页。

② 同上书，第284页。